



# 多维度视阈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探析

何一民 崔峰 何永之

**摘要:**202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条件。从全球维度、历史维度、地理维度、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深度分析,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决策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统一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在党中央和省市各级党委领导下,以改革开放促发展,以创新创造促发展,才能将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增长极和动力源。

**关键词:**多维度;成渝;双城经济圈;城市群;增长极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3.021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四川大学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培育项目“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一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mail: heyms@163.com;  
崔峰,男,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永之,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成都、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中国西部地区双星闪耀,党中央、国务院长期以来都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城市与经济的发展。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sup>①</sup>。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决策,赋予重庆和成都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新的历史使命:“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坚持不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着力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sup>②</sup>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一极两中心两地”为重要发展目标,即通过成都、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四川省与重庆直辖市两地的发展,进而承担起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历史重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将改变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新华网,2020年1月3日发布,2021年1月7日访问,https://www.ccps.gov.cn/xtt/202001/t20200103\_137294.shtml。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7日,第1版。

2020年初以来,有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研究成为热点,据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末,先后发表的相关文章近300篇,但是大多数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短文,深度研究的相关论著还较少。一年来,在国家发改委的主持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之中,但是总体来看,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的问题还较多,成渝竞争形态依然严重,相互间的博弈仍旧激烈,行政分割的弊端并未减少,故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除体制的因素、历史的惯性等导致很多问题需要时间来原因外,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少企业界、学界的人士和普通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有差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首先需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才能从竞争转向合作,才能打破藩篱,拆除围墙,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如何站高谋远,深刻地领会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意义,不仅要深入地学习相关指示,而且还需要放眼世界,以战略的视野、历史的眼光,以及从地理、经济、文化等维度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一 从全球维度和国家战略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决定的,需要站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来审视,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sup>①</sup>。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20世纪后期,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创新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全球经济和城市化出现新一轮高速增长,人类的经济活动和居住空间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不断加强,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方兴未艾,形成了全球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与必然选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或城市不再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竞争单元的主体,替代它们的是以城市集合体形式出现的城市群。”<sup>②</sup>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群日益发展,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全球范围内普遍承认的大型世界级城市群共有6个,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就占了5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对区域、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据相关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群,对整个GDP的贡献已超过了50%。如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的贡献率已达到67%,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对全国GDP的贡献率达到75%”<sup>③</sup>。随着世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群对区域与国家经济的贡献率还在不断提高,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已经成为了全球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更成为了国家发展、经济竞争的主要载体。

世界城市化发展具有共同规律,如阶段规律、聚集规律、大城市优先发展规律等,中国的城市化兴起后也同样受到这些规律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从分散向聚集转变,21世纪以来也出现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相继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但是中国地域广阔,仅靠东部三大城市群还难以带动中国整体发展,因而势必要建立更多的城市群来带动中国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地区需要有一个新的增长极。2015年以后,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包括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内的16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位于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发展长期受到党中央的重视,2011年4月,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要求“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sup>④</sup>。2016年,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明确要求成渝城市群“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and 培育发展中小城市为着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图片《手迹之五》。

②薛凤旋、郑艳婷、许志桦《国外城市群发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群的启示》,《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第147页。

③汪丽《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第40页。

④《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通知》(发改地区[2011]112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2011年6月2日发布,2021年1月7日访问,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106/t20110602\_962116.html。

力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sup>①</sup>。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和成都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发展规律,城市化和经济都出现快速增长,相继跻身中国城市“万亿俱乐部”。从当今全球城市体系来看,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2020年8月,全球知名的城市评级机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组织(GaWC)”发布了《世界城市名册2020》(“*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20*”),对世界城市进行评级,分为Alpha, Beta, Gamma, High Sufficiency, Sufficiency等5个等级<sup>③</sup>。Alpha级城市为世界一线城市, Beta级城市为世界二线城市。中国上榜一、二线的城市有近20个,其中“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台北、深圳次第居于世界一线城市,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长沙、厦门、郑州、沈阳、西安、大连、济南次第居于世界二线城市”<sup>④</sup>。其中成都居于Beta+,重庆居于Beta。成都、重庆作为世界二线城市,在世界城市中排名都较靠前,在中国上榜城市中排名分别居于第7位和第11位<sup>⑤</sup>。但是,无论成都还是重庆,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一线城市相比都还有相当的差距,因而要参与全球竞争,单靠一个城市还显势单力薄,故需双城联动,形成合力,成渝两地双城的整体综合实力将由此大大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会有很大提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作出了将成渝城市群构建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的重要决定,通过双核驱动,双中心创新,来带动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整体发展,这就是国家战略。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还是从中国的国家战略需要来看,成渝双城整合都具有必要性。尤其是2020年初以来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陷入发展困境,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对中国采取多方的打压,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持续不断,至今仍然是硝烟弥漫。2020年上半年,中国经受住了疫情考验和外部的挑战,经济在下半年出现了正增长,为了应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采取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作出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就是要推动和促进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sup>⑥</sup>。新的发展格局需要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超大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

从上可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世界发展大势所进行的战略决策,是应对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在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下所作出的正确选择;不仅着力解决成渝城市群内部发展问题,更是着眼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着眼于长远的谋划。因而我们需要从全球发展的高度来对党中央的决策加以认识。只有站高谋远,才能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意义,才能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准确把握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也才能顺势而为,因时而动,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成渝城市群建设,实现陆海联动,协同东、中、西部

①《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2016]68号),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6年4月15日发布,2021年1月7日访问,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15/content\\_5064431.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15/content_5064431.htm)。

②《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发改规划[2019]6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2019年3月31日发布,2021年1月7日访问,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4/W020190905514350734079.pdf>。

③GaWC,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20,” posted August 21, 2020,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lboro.ac.uk/gawc/world2020t.html>。

④GaWC,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20,” posted August 21, 2020,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lboro.ac.uk/gawc/world2020t.html>。

⑤GaWC,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20,” posted August 21, 2020,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lboro.ac.uk/gawc/world2020t.html>。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7日,第1版。

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更为充足的动力源。

## 二 从历史维度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渝地区有无建设经济圈的条件,还需要从历史维度加以审视。通过对历史节点的梳理,可以看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备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发展基础。成都、重庆均起源甚早,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双城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共同演绎出了双城携手共进、持续发展的篇章,为当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据史料记载,早在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形成了与中原华夏文明并立的巴蜀文明,并孕育出成都、江州(今重庆)等重要城市。成都为“《禹贡》梁州之域,夏、商以后为蜀国。秦灭蜀置蜀郡,汉因之,武帝兼置益州”<sup>①</sup>。江州(重庆)亦为“《禹贡》梁州之域,周为巴子国,秦灭巴置巴郡,两汉因之”<sup>②</sup>。

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成都城市文明起源于4500年前左右,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文化,构建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化发展序列。先秦时期,成都先后成为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都城。秦并巴蜀以后,成都就一直一直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大都会,长期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曾多次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都城,如东汉初年的成家,三国蜀汉,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和谯蜀,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和后蜀,北宋初年的大蜀,明末的大西等政权都曾以成都为都城,唐中期成都一度作为唐朝的陪都,被封为“南京”。元朝,四川行省建立以后,数百年来成都就几乎一直是四川的省会,至今未变。成都自先秦以来3000多年城址不变,城名不改,充分展示了城市的生命力。

重庆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先秦时为巴国都城,称“江州”。公元前11世纪,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因功勋显著而受封,巴国与西部的蜀国和东部的楚、庸等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疆域不断扩大。“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sup>③</sup>。据考证,巴子所筑江州城,在今重庆太平门至千厮门之间,为土城。巴国还在江州城东的铜锣峡外筑滩城,在城西龟亭山北岸的冬笋坝设集市,作为货物交易之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置巴郡,辖江州、枳县、朐忍、鱼复等县,以江州城为巴郡治所,张仪在江州古城基础上进一步扩建。汉承秦制,江州为永宁郡治所。由于江州城正处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是巴地对内对外的交通枢纽。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今重庆始称渝州,此后500多年一直为州治所而未发生变更,在此期间,战乱较少,经济有一定发展。宋代,重庆设府,经济有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进步、手工业发展、商业活跃、城镇兴起、人口增加等方面。清乾隆年间,重庆“商贾云屯,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sup>④</sup>。

总之,自秦以来,重庆由于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一直是川东地区的重要城市,而到清代则成为商贸繁盛的区域经济中心。

3000多年以来,成、渝双城在历史发展变迁中一直是唇齿相依,互动频繁,联系紧密。据《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sup>⑤</sup>“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sup>⑥</sup>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国与以江州(重庆)为中心的巴国比邻而居,奠定了成渝双城在此后3000余年间相互依傍、联系互动的历史基调。“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sup>⑦</sup>巴、蜀两国参与中原夏禹的诸侯盟会,并参加了周武王的伐纣之役,既直接反映了巴、蜀与中原王朝的互动频繁,也能间接反映出巴、蜀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变动频繁,成都与重庆既有互不统属、彼此平等的时候,如秦朝实行郡县制,成都与重庆分别为蜀郡与巴郡,并无上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131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3270页。

③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王尔鉴纂修《(乾隆)巴县志》卷10,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⑤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页。

⑥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13页。

⑦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页。

下从属关系;也有成都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城市,其行政影响力高于重庆的时候,如元明清时期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其影响力和地位高于重庆。但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成都和重庆一直保持着相互密切联系的关系,成都居巴蜀而控四境,重庆则为锁钥扼守川东门户,双城唇齿相依,经济与文化相互联动,人口也多有流动往来。

近代以前,成、渝之间的关系多以成都为重心;近代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渝双城并列格局开始形成。19世纪末以后,重庆相继实现了三级跳和城市转型。一是重庆因1890年开埠通商而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市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现代工商业呈现较快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由此推动了城市功能转型。二是辛亥革命爆发后,重庆较成都率先独立,建立省级政权蜀军都督府。中华民国建立后,成、渝两个省级政权合并,重庆成为留守府所在地,其行政地位有所提高。1929年重庆设市,在全国和全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刘湘任四川省长期间,长期盘踞重庆,苦心经营,发展经济,建设文化,改善基础设施,为其后成为陪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失守,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确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其行政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实现了第三级跳。1939年,改重庆市为直辖市。1940年,国民政府定重庆市为“陪都”,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远东指挥中心,极大地提升了重庆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抗战时期,四川地区初步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城市体系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城市体系。<sup>①</sup>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都仍为四川省省会,重庆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1953年,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改为四川省直辖市,川东地区另设万县、涪陵、酉阳、永川等地区。1983年,中央将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实行市辖县制。1997年3月,又将万县、涪陵、黔江等地市与地区划入重庆市,设立重庆直辖市。2010年,重庆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体系中最高层级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2011年5月,国务院批复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格局初步形成。

从历史视阈来看,成、渝双城植根深远,底蕴深厚,唇齿相依,互动频繁,联系紧密。近代以后,随着重庆的崛起,初步形成了长江上游以成都和重庆为双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规划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国土空间格局大调整,可以说既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符合历史演进的大趋势。

### 三 从地理维度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建设不仅有着天时和历史基础,而且还有着地利,有着优越的地缘关系和地理基础。成渝双城共同孕育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四川盆地,共居亚洲最长之江河——长江的上游。四川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西临青藏高原,南接云贵高原,东为长江三峡,北近秦岭大巴山脉,四周高原、山脉延绵,内部平原广布、河流纵横,从而形成了典型的盆地地形。四川盆地的大致范围是从东经103°到108°,北纬28°到32°,盆地内多为紫色土壤,土地肥沃,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适宜,降水充沛,因此四川盆地适宜农业耕作,物产丰饶,农业经济兴起很早,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域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流淌,最后经崇明岛入海口汇入东海,全长6387公里,长度为世界第一、亚洲第一,水能充沛位于世界第一。长江是成都和重庆的母亲河,两城皆因水而兴,因水而发,可以说没有长江也就没有成都和重庆这两座重要的城市。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之上,“山川重阻,地大而要”<sup>②</sup>;长江主要支流岷江从岷山奔腾而下,在成都平原呈扇状分布,故而成都平原地势平坦,腹地广阔,水源丰富,物产富饶,经济繁庶,从而为数千年成都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重庆则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河谷山地之中,“会川蜀之众

<sup>①</sup>何一民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

<sup>②</sup>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3132页。

水,控瞿唐之上游,临馭蛮楚,地形险要”<sup>①</sup>。成都和重庆的自然地理环境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成都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成都发展传统农业比重庆更有优势,成都平原自然资源丰富,百物充裕,“山林泽渔,园圃瓜果,百谷蕃庠,四节代熟。桑、漆、麻、苧靡不有焉。”<sup>②</sup>战国时期秦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工程,变水害为水利,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sup>③</sup>。重庆居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两江流域,江河纵横,水流喷涌冲击,加之大巴山脉连亘其间,因此形成了河谷、山地交错杂陈的地形特质,地势不平,农耕不便,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其自然资源的丰富多样仍是著于史籍:“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sup>④</sup>虽然重庆的农业较成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充足的水利资源却为水运和商业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古以来,重庆码头林立,舳舻千里,航船顺江而下,将巴蜀地区的粮食及各类土特产品运送到长江中下游及全国;另外,重庆还成为川、云、贵、藏、湘、鄂经济交互往来的商品集散地,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90年,重庆被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列强纷纷在重庆修建租界,设立领事馆,伴随着列强的经济侵略,重庆的航运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使得重庆的近代工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在农业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成都和重庆的经济、文化互动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成、渝双城两地具有天然的联系,虽然一城在盆地西部,一城在盆地东南,但双城山水相连,相互依存,往来密切。以水路而言,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就开通了与重庆的水上交通,其船可经岷江至宜宾,再顺江而下可直达重庆;另外,从成都也可乘船经沱江至泸州,顺长江而下直抵重庆。重庆亦可经上述水路溯江而上直达成都。《蜀王本纪》载楚人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sup>⑤</sup>。战国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认为蜀地“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sup>⑥</sup>。秦统一天下之时,即以成都为基地造船,然后千船竞发顺江而下,直捣楚国。相关记载不绝于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重庆与成都之间水上交通的联系与发展。成都与重庆之间的陆路交通更是很早就得到开发,唐宋以后则形成了完备的陆路交通体系,成渝陆路交通主要有东大路和东小路,沿途各类设施齐全<sup>⑦</sup>。

进入近现代以后,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成、渝交通联系日益方便,时空距离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成、渝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被缩短。1952年7月,成渝铁路正式通车,成、渝时空距离从一周缩短为一天。1987年12月,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全线建成,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成、渝时空距离缩短为10个小时左右。1995年9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成、渝时空距离再缩短为4个小时。2006年5月,遂渝铁路建成通车,成渝铁路行驶时间缩短至4个半小时,与高速公路不相上下。2007年7月,成遂铁路建成并全线通车,成、渝时空距离缩短至3个半小时。2007年12月,渝遂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公路客运行驶时间进一步压缩到3小时20分。2009年9月,“和谐号动车”组正式于成遂渝铁路开行,成、渝时空距离缩短为2个小时以内。2015年12月,成渝高铁开通,CRH380D型高速动车组投用,成、渝时空距离缩短到1小时29分。2020年12月,成渝进入高铁时代,其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至1小时。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渝陆上交通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随着一系列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成渝双城两地1小时经济圈正在形成。现代“交通革命”为成都和重庆一体化、同城化发展奠定了坚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3271页。

②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13页。

③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3页。

④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页。

⑤ 扬雄《蜀王本纪》,扬雄著、张震译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⑥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6页。

⑦ “东大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大坪七牌坊—石桥铺—二郎关—白市驿—走马铺—来凤驿—永川—荣昌—峰高驿—隆昌(隆桥驿)—安仁驿—内江—珠江驿—资中—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东小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六店子—小龙坎—歌乐山—三百梯—高店子—西永—虎溪—璧山—铜梁—安岳—乐至—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参见:李盛虎、金良等《成渝古道 古时重庆商贸第一大道》,《环球人文地理》2013年第8期,第37页。

实的基础设施条件,双城互动更加频繁,沟通更加顺畅。

从上可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是成渝地理共同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双城的紧密联系、深度合作与快速发展。

#### 四 从经济维度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党中央提出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除了基于全球的、历史的、地理的原因外,加强成都和重庆双城两地经济协调与融合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也是其重要的原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和重庆分别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两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其产业结构日益健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1978年成都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为35.94亿元”<sup>①</sup>,2020年成都“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716.7亿元”<sup>②</sup>,2020年是1978年的492倍。1978年重庆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为67.32亿元<sup>③</sup>,2020年重庆“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sup>④</sup>,2020年是1978年的371倍。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重庆的地区生产总值都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反映了成渝双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动力和潜力。当前,成都、重庆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各大城市中更是遥遥领先。成渝双城人才集中,科技发达,资金雄厚,“成都是全国第一个把新经济作为核心发展战略的城市,重庆基于制造业基础优势提出‘大数据智能化’战略”<sup>⑤</sup>。成、渝分别都在互联网医疗、数字文创等领域具备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汽车生产、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与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也在日益崛起,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后,成渝双城的经济水平不断增长,实现了量和质的飞跃性发展。但是,无论重庆还是成都的经济总量,与东部重要城市相比,仍然有所不足。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sup>⑥</sup>,成渝地区生产总值之和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2020年珠三角核心区“地区生产总值为89523.93亿元”<sup>⑦</sup>,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由此可见,目前成渝地区经济与珠三角核心区经济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放眼全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群,对整个GDP的贡献已超过了50%”<sup>⑧</sup>。无疑,成渝地区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GDP的贡献占比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群相比仍是相形见绌。因此,成都和重庆只有加强产业合作,聚合双城两地力量,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双核驱动,才能真正承担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战略任务。

但由于行政区划等因素制约,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经济互动不尽如人意,产业整合度和融合度不高,甚至还存在一定的隔阂与暗中的较量。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和重庆由于多种原因处于相互竞争态势之下,部分产业布局趋同,产业结构类似。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双城两地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态势越发加剧。有研究者早就明确指出,“成、渝这两个我国西部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和相对发达的地区少了合作,更多地是盲目的竞争”,“区域产业结构存在较高的相似程度”<sup>⑨</sup>。成、渝在汽车、电子信息、通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结构上高度相似,长期以来竞争激烈,彼此损耗严重。以汽车产业为例,重庆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汽车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长安汽车集团深耕渝土,发展至今已经建成了规模庞大的千亿汽车城,产业链完善,集制造与研发为一体,是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一方重镇。成都的汽车产业曾因重庆直辖而出现下滑,进入21世纪后,则奋起直追,已经从低端到高端,从零散到集群,逐步建立了集汽车产业研发、制造、商贸和运动为一体的重要产业基地,形成了规模庞大、产值达数千亿的龙泉国际汽车城,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

① 蒋君芳整理《成都:革新者的“万亿”向上之路》,《四川日报》2018年12月17日,第17版。

② 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2020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日报》2021年3月27日,第3版。

③ 重庆市志·经济地理志课题组编纂《重庆市志·经济地理志(1891—200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④ 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20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日报》2021年3月18日,第13版。

⑤ 陶玉祥《成渝新经济领跑高质量增长》,《科技日报》2020年7月30日,第7版。

⑥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第10版。

⑦ 广东省统计局调查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2020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南方日报》2021年3月1日,第A04版。

⑧ 汪丽《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第40页。

⑨ 罗若愚、赵洁《成渝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探析与政策选择》,《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年第5期,第42页。

尔沃等知名车企纷纷入驻。重庆、成都在汽车产业上的你追我赶,成为双城两地产业结构雷同、盲目竞争的一个显例。成渝之间也因多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区域贸易壁垒,阻碍了双城两地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事实上的贸易区域分割,进而恶化市场环境,限制产业分工发展。因而,成都和重庆双城经济,分则两害,合则两利,成渝双城既要竞争更要合作。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制定之际,中央就明确提出建设“成渝经济区”。重庆、四川及成都相继确立了相应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进“成渝经济区”的建设。2011年,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制定公布。2016年,成渝城市群规划出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成渝经济区的建设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整合等问题。

近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中国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在这新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成渝两地双城经济的整合和融合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因而一方面要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加强双城经济圈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企业需要摒弃嫌隙,深化合作,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形成优势互补,创造聚合效应,汇聚双城相同产业的全部力量,打造出具有中国影响力乃至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另外,对于趋同且效益不高的产业,则可以结合双城两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产业调整,避免盲目的恶性竞争,减少区域内耗。

虽然当下成都、重庆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各有特色,因此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通过构建“一极两中心两地”为核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以充分实现成都、重庆双城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双核驱动,协同发展。以三大产业划分来看,2020年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1803.33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9992.21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13207.25亿元,增长2.9%。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40.0:52.8。”<sup>①</sup>2020年成都“第一产业增加值655.2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5418.5亿元,增长4.8%;第三产业增加值11643.0亿元,增长3.6%。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7%、45.1%、52.2%。三次产业结构为3.7:30.6:65.7。”<sup>②</sup>从上述统计数据看,成都和重庆都是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远大于第一产业,产业结构比例比较合理,但是,仍须注意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下三大产业的协同发展与相互配合问题。就第一产业而言,虽然所占比重不高,但仍不能忽略其发展,尤需加强与第二、三产业的紧密融合,推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信息化,利用电商网络平台、物流产业来推广农业产品销售,增加农业经济效益,使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就第二产业而言,成、渝各有特色,重庆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内领先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其他城市;但成都的部分制造业也具优势,为中国西部聚集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并以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的构建为中心,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全球各领域高端要素向成都集聚,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因而,重庆和成都的制造业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各自实力,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尤其是增加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需求和高要求;另一方面要形成错位发展,并吸引周边区域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聚资源,创造就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而就第三产业而言,成、渝两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在伯仲之间,只是成都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比重庆更高一点,一些新兴产业发展更快。如近年来成都在建设世界文创之城的战略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2018年成都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1172.9亿元,首次迈上千亿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64%;2019年成都全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1459.8亿元,同比增长24.5%,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58%。<sup>③</sup>重庆的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也有很大发展,并在制度环境、文化资源环境、创意人才环境及法律法规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建设,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相比成都仍有不足。因而成、渝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加强合作,形成互补。总体而言,成、渝第三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辅助和促进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并向高端化发展,促进双城两地整个区域间的信息、人才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序流动,形成良性的双核驱

①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20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日报》2021年3月18日,第13版。

②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2020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日报》2021年3月27日,第3版。

③成都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社科院《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20)》(内部文稿),2020年,第2页。



动、区域协同、产业优化配合的新局面。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差距甚大。中央正是着眼于中国整体的发展,就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发展大格局,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目的就在于打造“一极两中心两地”,使之成为继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以此带动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 五 从文化维度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文化是城市之魂,文化在区域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在不断提升。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的建设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

据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研究,古代巴和蜀“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区”<sup>①</sup>。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皆属巴蜀文化体系。以成都为中心而形成的蜀文化和以重庆为中心形成的巴文化,都共同根源于土壤肥沃、降水丰沛、气温适宜、自然条件优越的巴蜀地区。正是巴蜀地区的好山好水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蜀文化与底蕴深厚的巴文化。

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从地域文化空间来讲,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所创造产生的区域性文化。巴蜀地区范围较广,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然以四川盆地为主体。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包括四川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这一广大的地区在历史上被泛称为蜀地,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巴文化则是以重庆为中心,以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区域为主要空间范围。

巴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如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和 3.5 万年前的资阳人。这是传说中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sup>②</sup>的时代,可见巴蜀地区人类起源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巴蜀地区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和玉器文化时代。距今 4500 年前成都平原 6 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城市文明的曙光在成都平原初现。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金沙文化,即是成都平原进入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重庆、达州等地发现了一系列巴文化遗址,也以众多的历史实物充分证明了早期巴文化的存在和巴文化的灿烂。

巴、蜀文化同根同源,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薪火相传,自古至今,文脉不断,生生不息。政治上有着共同归属,经济上相互交流,地理上比邻而居,文化上相互交融、合流汇通、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灿烂辉煌的巴蜀文化体系。巴蜀文化具有整体性,巴文化与蜀文化亲缘相近,演变动力机制相同,巴人和蜀人都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因此在早期巴蜀文化形成过程中,巴文化与蜀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凝聚和集结成了相同的文化特质,实现了最大的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秦并巴蜀后,巴蜀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交汇、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更为广泛文化认同的中华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巴蜀文化在不断强化与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也在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形成了区域文化特色。总的说来,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既融合为一体,又保持了一定的个性和特色。在巴蜀文化内部也是如此,巴文化与蜀文化既融合为一体,又各自保持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质和个性,巴人和蜀人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性,也许域外之人不易分清,但域内之人都能明确地感知。

巴蜀文化作为区域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之一,而蜀文化与巴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两个分支体系。蜀文化与巴文化各自因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sup>③</sup>,而蜀地“其卦值坤,故多班彩文章。……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sup>④</sup>。反映出巴人性格质朴自然、木讷迟钝,而蜀人性格聪明狡黠、极具文采,二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古巴蜀地区流传

①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②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 113 页。

③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 5 页。

④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 113 页。

着的一句俗语,即“‘巴有将,蜀有相’也”<sup>①</sup>,蜀地多出相才,而巴地多出将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但是必须看到巴文化与蜀文化虽有差异,但其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文化的整体性和一体性大于差异性,巴、蜀文化首先具有一体性、整体性、统一性,然后才是个性特色和差异性,个性特色和差异性都寓于整体性、统一性之中。数千年来以巴蜀地域为基础的巴蜀文化将不同的文化因子加以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理结构,并在巴蜀之人的生产和生活等多方面形成了一致性和整体性;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方面巴蜀之人也都保持了文化的整体性,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有别于中国其它区域的文化,因此巴文化与蜀文化虽有差异性,但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文化体系。近年来由于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出现的“去四川化”现象和某些成渝网民之间出现的“口水战”,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倾向,不利于构建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加以正确导向。成渝之间的民众更要摒弃文化对立情绪,以历史悠久、渊源深远的巴蜀文化为根基,促进双城文化一体化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巴蜀文化则是中华文化体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巴蜀人民数千年的智慧结晶。文化作为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区域、城市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文化,同根同源,汇通合流,共同形成了辉煌灿烂、传承千年的巴蜀文化。成渝双城兄弟情深,血脉相连、生生不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符合巴蜀文化的共同属性与价值取向。因而,传承巴蜀文化,构建成渝文化共同体,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 六 思考与建议

21世纪以来,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形势越发云谲波诡,变化多端,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复杂,进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变革期。城市作为国家以及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今世界竞争、国家角逐最为重要的竞争中心所在,以城市群作为带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潮流和趋势。因而,党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决策,具有科学性、正确性、前瞻性,可谓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把握了世界发展之潮流,顺应了时代发展之趋势,契合成渝双城之历史底蕴,合乎巴蜀地理山川之特性,并以血脉相联的巴蜀文化为支撑,统筹协调成渝双城与东、中、西部以及全国一盘棋整体发展,毋庸置疑是科学的战略决策。为了深化对党中央决策的认识,推动成渝两地经济圈建设,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深化对党中央关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意义的认识。近年来,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统筹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之中,川、渝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了切实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也相继出台了若干政策和措施。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构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当下还存在若干有形和无形的困难与隐忧,必须充分认识到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并非只是中央的决定,或只是川渝自身的发展,而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关系到中国西部能否整体发展。因而需要自上而下地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只有从思想上根本解决了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才能促进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充分流动,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主体作用;民众也才能积极参与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共建共享之中。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推动成渝双核联动,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创中心和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大城市群。对标长江三角城市群,建立重大政策协同、重要领域协作、市场主体联动机制。正确处理好渝、川、成三个行政主体的关系,树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筹协调,以共建、共进、共保、共赢、共享为基本原则,创新成渝两地双城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立规则统一的制度体系,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完善多层次多领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坚持川渝一盘棋思维,在中央相关部委指导下统一编制各类发展规划,相关政策措施一体部署,共同实施,协同管

<sup>①</sup>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5页。

理。在优化整合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内的各类资源的基础上,成渝各自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在一定范围内探求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适度分离,进而加强交通、产业、科技、环保、民生政策协同对接,加快区域内经济的深度融合。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共享高品质教育医疗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合作发展,共建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

第三,优化重庆和成都等大中小城市功能,提升重庆主城区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共同引领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优化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产力一体化布局,加快成渝双城全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制造业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共同推动双城两地信息基础设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实现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互联互通;共同打造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大力发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专业化服务,提升各领域融合发展、信息化协同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主体活动,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军民企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第四,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双城经济圈建设创造条件。在中央相关部门协同下,川、渝合力共建两地双城经济圈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一是合力建设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力争在5—10年内实现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大中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全覆盖;二是全力建设以成、渝机场为国际门户航空枢纽,以川、渝中等城市机场为节点的现代化机场群;三是合力构建多类型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体系;四是合力建设以长江为主干的川渝大江大河航运体系。在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基础上,建立以高铁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成渝城市群内部各大中小城市的连接纽带,以更加高效集约的方式,极大地降低成渝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成本。

第五,整合和融合双城科技资源,合力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成都东进,重庆西进,加强成都天府新区、西部(成都)科学城与重庆两江新区和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科技创新合作,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鼓励科技研发活动,推动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快速转变,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的科技产业集群,从而形成科技创新中心。

第六,整合巴蜀文化资源,提升成渝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成渝文化共同体,促进成渝两地双城文旅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近年来,成都和重庆分别凭借历史、文化、美食、美景所带来的高曝光度与号召力,形成了“网红城市”的名片,分别成为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城市。2019年重庆的游客达6亿多人,成都的游客近3亿人,而四川的游客则多达7亿多人。成渝两地双城应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实现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以文化软实力提升来推动文旅产业大发展,进而带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发展。

第七,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成渝两地双城共保联治,共同加强生态保护,推进环境协同防治,推动生态环境协同监管,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第八,共同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共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协同推进开放合作,合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国际现代化大都会和世界文化名城。

通过以上的改革开放与创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加快推进,并释放出更多更大的发展潜力,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带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

[责任编辑:何毅]